

文學與寫實——從《官場現形記》看晚清染缸文化

張珮璇

一、前言

作為晚清諷刺小說之一，《官場現形記》的確有著重要的地位，而因其所描述對象，主要以當時的官場生態為主，因此，也突顯了晚清時期人民與政府間，那複雜錯綜的關係。文本以官場文化作為主要敘述內容，從這之中可以得知，作者所關注的，顯然是以百姓的焦點為中心，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的認為，從文本內容所描述的情節，官場內的所扮演的角色，各個處於負面評價的形象建構，那麼，作為官場角色所壓迫的對象，顯然就是以無助老百姓所扮演。

從敘述手法上來觀察，《官場現形記》描寫的，似乎少了上層知識份子文學手法上刻意的雕琢，其所反應出的，是更質樸且直接的情感，然而這背後所呈現的，卻是真實而殘酷的官場面貌。文本不僅有揭露惡劣政府官員後，所得來的快感，同時也使人們迫切的思索，社會秩序亦或天下之維持方式，也就是說文本的角度是站在人民一方；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又是如何，當中更透露了哪些上層知識份子與基層知識份子的對話，都值得注意，也是文本之價值所在。研究先從人物之塑造開始談起，從文本中最主要的人物——官——看出作者之世界觀，即是文人對該時代所代表精神的關照；進而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做分析，並以此作更深入的討論。因此，在解讀文本的同時，便能夠觀察出作者所隱含之意識形態，並藉由小說的傳達，完成了上層知識份子與基層知識份子間的對話。

二、社會現實的反映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官僚機構，有如金字塔結構般，一層層堆疊從基層的知縣、知府、道台、巡撫、總督，到接近中央尚書，欽差大臣。這樣的金字塔的結構，有種特殊的封閉性與緊密的依附關係，所謂官官相護，就是清楚的形容官場中官員之間，互相庇護，甚至是隱瞞的情形，另一方面，在金字塔底層，受官員管轄之下，按時繳納賦稅，只知自己的地方官清廉與否，有些甚至一無所知，更遑論更上層的官員，就連身處金字塔的頂端，掌握權力中心的皇帝，也會被中央官員欺瞞矇蔽，以為天下昇平，殊不知百姓疾苦，官員為虎作悵。就是由於如同金字塔般層層堆疊，而牢不可破的現實局面，《官場現形記》所透露的，已經不是對

於環境的不滿而宣洩，更深刻的說，文本所要呈現的，是對於人性心理與現實環境的緊密聯繫，這樣的概念可以夠過馬克思主義來做一些簡單的解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產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將現實社會與人性做了連結，甚至，更進一步將人性的無奈與絕望，透過黑暗的官場做出反應，也即是如同引文所說「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小說中也以「千里為官只為財」成為對晚清現象的批判與諷刺：

俗語說的好：「千里為官只為財。」做書的人實實在在沒有瞧見真不要錢的人，所以也無從捏造了。

因此，李伯元所出版《官場現形記》，初在《世界繁華報》中刊載大受好評，爭相購閱者不斷，還出現了盜版遭人刻印，如此風靡，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李伯元揭發了這金字塔中的內幕，以「現形」的方式，讓廣大民眾得以一窺這箇中奧秘，將官場赤裸的呈現在每位讀者眼前。而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中所使用的窺視手法，以及在作者筆下各層地方官、文官、武官的描繪。

三、對墮落歷程的刻劃

假設單純以貪官汙吏作為描述對象，那文本的情節安排便會淪於過度刻版，因此，作者乃取一腳色，以其原先並非貪官之形象，透過種種經歷，以致於最後墮落的過程，這樣的手法，不僅展現了人性的脆弱，同時，也展現了整體大環境之難以對抗之可怕。

藩台先問他：「這個局子是幾時開的？一共刻了多少書？」王慕善道：「回大人的話，從卑職曾祖手裡以至傳到如今，一直以行善為念。到卑職父親晚年，就想創個『善書會』；苦於力量不足，沒有辦得起來。卑職仰承先志，現在雖

然粗具規模，然而經費總還不夠，所刻的書亦有限得很，剛才 呈上來的幾部都是的。卑職此業，一來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來還有和篇淫書目錄，等大人寓目之後，求大人賞張告示，嚴行禁止，免得擾亂人心。」一面說，一面 又站起來把呈上來的書檢出二部，指著說道：「凡事以尊主為本，所以卑職特地注了這部《聖諭廣訓圖釋》，是專門預備將來進呈用的。這一部《太上感應篇詳解》，是卑職仰體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聽說制台大人極信奉的是道教，這《太上感應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親手著的救世真言，卑職足足費了三年零六個月 工夫，方才解釋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賞張告示，禁止收買翻刻，只准卑局一家專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後有什麼善書，便可多刻幾部。就是大人有什麼著作，卑局亦可效勞。」

起初王慕善在出場時，儼然如他名字一般，「慕善」，官場現形記將王慕善設定成刻善書和搜淫書的好人，為了想要辦善書會，特去請求藩台。劇情到這裡都還算普通，直到藩台要求王慕善送幾百部善書，才把最重要的問題——錢給點出來：

王慕善道：「請大人的示：這筆書價，卑職還是具個領字由大人這裡來領呢？還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後再到大人庫上來領呢？藩台初 意，以為他這些善書雖然賣錢，至於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給各府、州，縣看的。今見他論到書價，心上便有點不高興。」

王慕善以為藩台要買善書，藩台則以為王慕善要送善書，這一誤會下去，藩台本來就對善書沒什麼興趣，現在更搞得想要敷衍，果不其然，到了晚上馬上就搭輪船回省了，只留王慕善在那癡心妄想。王慕善在與藩台會面過後，以為自己的書局跟「官」有了關係，便把招牌改成奉憲設立善書總局，伙計改叫司事，自己也要人稱他為總辦，這也讓官場現形記中少數的好人，漸漸走向墮落之路，而墮落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錢。

四、知識分子的理想寄託與諷刺

中國的詩教所要求的是「溫柔敦厚」，諷刺一但超過這個界限，那就會淪為謾罵。傳統的諷刺小說將場景設定在現實生活面上，將諷刺的目的與生活作緊密的結合。知識份子所以會對社會作出批判，進而使諷刺小說出現，最大的原因應當是對社會還抱有一絲希望。假使單就文本而言，《官場現形記》在鬧劇上佔了很大的成分，然而事實上，如果從平民百姓的眼光來觀察，文本當中所描述的一

切情節與人物，是近乎悲劇形式的。悲劇源自希臘，形成的原因就在於明知道辦不到，卻還是毅然決然的去做，僅管西方的思惟與中國的傳統哲學觀念畢竟不同，然而中國的知識份子仍然具有這樣的意識。

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向是為民的，然而這個「民」並非人民，而是人性，一但當權者，也就是政治背離了這著「民」，知識份子就會跳出來說話了；李寶嘉在《官場現形記》中所要諷刺的，就是人性已經完全扭曲了。《官場現形記》當中的取材，都是來自於現實社會生活，作者只是將這些題材典型化，而不做主觀的論述，並且不按照某種道德標準，而去改動當中的人物，使讀者透過這些客觀的事物，搭配自己對人生的體悟，進而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諷刺意涵。本此研究將主題分為兩大類，即文本內部衝突與與作者意識。在文本分析上採用文學性與社會性兩種脈絡思考，並且格外注重時代精神所隱含之影響，也就是歷史脈絡與小說脈絡之關係，同時更藉由意識形態之觀察，揭示作者個人之主觀意識，也展現知識份子內心的情感。

國家體制的運作究竟應當由什麼力量做維持，這樣的答案就理想性而言，自然是雙方的，然而實際上的進行卻完全不這麼一回事，因此問題便會落在政府與人民中，誰佔支配地位的比重是較高的，從意識形態看，居於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會因為自己的地位而產生優越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居於上層政府官員，便會利用這樣的權勢，進而壓迫處於下層的人民。上層與下層就辭面意義上，其關係有著一定的距離，而組織架構越龐大，這樣的距離也就更為遙遠，因此上層知識分子在維護國家體系時，其作為自然不可能完全顧及基層，也就是這樣的原因，使得基層與上層的關係也出現隔閡，最後引發對立。也許我們可以認為，《官場現形記》當中所描寫的政府官員，就是因為上層社會的高度腐敗，才會引發內心黑暗的一面，而成為如文本當中所描繪的貪官污吏。

在典型諷刺小說中，人性的弱點可以被無限的擴大，然而情節越是誇張，正代表時代越是黑暗，每一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時代都不一樣，然而平民大眾卻必須接受任何一個時代，他們無法反抗，也可以說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反抗，因為接受被確立的價值觀，早已經根深蒂固在他們的心中，而這也是知識份子所要改變的，諷刺也因此而出現。

寫實主義文學乃是透過對於現實世界的反應而產生，為了完成這種目的，寫實主義的小說家必須展示兩種可能的情況：其一為具體的可能性，其二為抽象的

可能性，關於這兩種可能性，盧卡契有以下說法：

抽象的可能性完全屬於主觀的範圍，而具體的可能則是與個人主觀性和客官現實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相關的。在文學上表現後者，意味著描寫生活於可感知的和可認識的世界官中的那些真實的人。只有在人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中，某一個別人物的具體可能性，才能與「極為無限」的純抽象可能性分開，成為此一個人在它的此一階段起決定作用的可能性。

由於以上的說法，證實了小說家對於如《官場現形記》這類諷刺小說的文學其寫實的一面。這即是說，文學不單僅止於文學的觀賞功能，而是具備了警世的作用，雖然這樣的文學功能在《官場現形記》這部小說出現以前便已經普遍存在於文學界，然而對於人性的刻劃，以及對離民間越來越遠的王師與政府，《官場現形記》仍然顯得有其價值，理由就在於，透過知識份子的書寫過程，小說產生了某種場域，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人民間的對話空間，透過文學的空間，知識分子的目的確實傳達了，而經由小說所獲得資訊的人民，亦能夠進一步傳播《官場現形記》所蘊含的諷刺內容。

五、結論

在《官場現形記》的全部情節中，除了由清官衍生而成的酷吏之外，最多的，便是貪官汙吏，而又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文本全由貪官汙吏的角色充斥，如果單以時代背景來作分析則顯得過單調，或許能夠從人性心理上進行分析，而又以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為可能的心理投射：

集體無意識只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構成個人無意識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但以後由於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中消失了的內容；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從來就沒有出現在意識之中，因此也就從未為個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於遺傳。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各種情節構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原型。

透過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官場現形記》的作者將內心的世界清晰的描繪出來，這當中所呈現的，已經不單指是對於現實的不滿而書寫的憤怒，文本所代表的，同時也是晚清知識分子內心的共通心理。正由於如此的展演，《官場現形記》這

樣的小說不只是脫離了純文學的形式，同時也更進一步採取比以往小說更為激烈的手段出呈現，這樣的手段並非是殘酷的虐殺，而是透過情節的發展，以充斥於小說的貪官汙吏所呈現的絕望感。

文學是作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呈現，其理解方式的主導，即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精神或意識形態。意識型態並非教義，它使人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之角色，因此，文學是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阻礙了人真正解這個世界。正是對於現實社會的絕望，《官場現形記》出現了連清官也只能受環境制約的情節：

卻說浙江吏治，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竭力整頓，雖然不能有十二分起色，然而局面已為之一變。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卻是真正的一個清官：照壁舊了也不彩畫；轅門倒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首縣奉了他的命，不敢前來辦差。……一天，適當轅期，會客之後，回到上房吃飯。正想吃過飯考問兒子的功課。他一向吃飯，因為人少，都是姨太太陪著吃的。這日等了半天，姨太太竟未出來。他總以為姨太太另有別的事情，偶然遲到，不以為意，誰知等到吃完，姨太太始終不見。問問老媽，都不肯說話。後來又問兒畢竟兒子年輕嘴快，回稱：「我娘困在床上，從早上哭到此刻，還沒有梳頭。」傅撫院聽了詫異，一時摸不著頭腦，只得又問兒子。旁邊伺候的老媽一齊做眉眼給少爺，叫他不要說。被傅撫院瞧見，罵了老媽兩句說：「你們偏會鬼鬼祟祟，有甚麼事情要瞞我？」一定追著兒子要問個明白。少爺無法，只得說道：「我亦不知道甚麼。今兒早上，門上湯二爺來說，有個媳婦長的很標致，還帶了一個孩子，說是來找爸爸的。我娘就為著這個生氣。」

清官的墮落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作者顯然是為了達到將官場「現形」的目的，進而將無盡的官場現象盡覽於小說之中。作者所還原的，不只是官場的系統，同時，作者亦還原那些官員的心理與人性。為了能夠將官場的現實忠實的呈現於讀者面前，作者所要進行的，不能指是簡單的做出相同的描繪，如果只能做完全一樣的拷貝，那文學的價值便沒有意義，因此，作者採取人性的刻劃，以讀者的思維書寫，再一次有效的還原官場黑暗的事實：

「文化逼真」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被做為檢驗敘事的真實性的標準：如果人物符合當時普遍接受的類型和準則，讀者就感到它是可信的。諺語和定型反映著共同的文化態度，從而就提供了證據，證明作者如實

地再現了這個世界。

透過「文化逼真」的準則，《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成功的再現官場事實，其除了反映晚清官場文化的現實生活以外，同時，也透過讀者——即人民——的感受，再一次深刻的強化了人民內心對官場的痛恨與己身所受苦難。正由於將人性的感知與真實環境作了連結，《官場現形記》才能夠以清晰而真實的樣貌，將晚清的黑暗呈現於讀者面前。